

摘 要

宗教不仅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而且还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对人类历史和社会文明以及现实生活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它并没有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日益世俗化而在现代化浪潮中衰微，相反却以越来越多的信徒和各种新的形式更加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在我国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宗教的发展也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它的背后隐藏着民众深沉的精神追求。因此，研究和考察转型期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不仅关系到理解社会现实、把握社会发展脉搏，而且关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人格精神架构。

当前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快速转型的时期。社会转型呈现出整体性、多元性和不平衡性的特征，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社会成员之间贫富差距扩大与社会不公、社会焦虑、人际关系淡漠、价值混乱和社会道德滑坡等现象。这就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社会转型带来的心理阵痛是民众寻求宗教依归的内在动因；世俗化导致的工具理性膨胀、个体价值虚无化为民众皈依宗教提供了信仰空间；道德滑坡、人际关系商品化带来的“情感沙漠”为民众信仰宗教提供了土壤，而社会贪污腐败现象则成为民众皈依宗教的催化剂。虽然民众信仰宗教的个体动因大多是基于生病、个人成长、进步、意义缺失等世俗需要，但更重要的是隐藏在这些世俗动因背后的深刻的社会根源。由此社会转型对民众的宗教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其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信教人数增多，信徒内部构成发生变化，分布呈现“两极性”特征；在宗教组织形态上，与西方宗教世俗化由制度宗教向个人宗教转化相反，正在实现由普化宗教向制度型宗教的转移。

本论文选取了山西省太原市天主教沙沟堂区和太谷县两个区域社会作为研究样本，对民众宗教信仰的契机、宗教皈依的支持因素和信仰参与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转型期民众接触和皈依宗教的过程是一个主动与被动的双重变奏、非理性与理性的二律背反、功利与超越的双重交织。由此本文得出结论：民众的宗教信仰与社会

变迁之间存在着逻辑关联和非逻辑关联，将民众的宗教信仰简单地视为落后和迷信，实际上是对民众精神世界的极大的误解和鄙视。因此，我们应当客观评价民众的宗教信仰，对其加强引导，积极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关键词： 社会转型；宗教信仰；基督教徒

ABSTRACT

Being a kind of special ideology and a kind of important social culture phenomenon, religious affect the history of humanity, social civilization and the life of people deeply. Today in the 21st century, 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social life become common customs day by day, religion has not only declined in modernization life but also affected the life of humanity with more and more believers and all kinds of new forms. In our country, especially after 1980s, the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also becomes an important social phenomenon. Behind that, there exist people's spiritual pursue. Therefore, it's necessary to research people's religious belief in transformational society. And it will not only relate to understand social reality, hold the pulse of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to construct the frame of personality and spirit of people in Socialism Harmonious Society.

Our country is in the period that makes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y to modern society quickly with four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integration, pluralism and unbalance. The transformation also gives rise to many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greater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social anxiety, rampant corruption, indifference between people, value confusion and the lack of unified criterion etc. And these problems also provided the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People believe religion mostly because of actual needs, such as illness, lack of meaning and progress etc. The deep social reason after that is more important. Religion demonstrates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 The number of believers increases and the structure changes, religious develop unevenly in different area; religious organization transfers from diffused religion to institutional religion.

This thesis takes Shagou Church and Taigu county in Shanxi Province as sample and surveys people's religious belief, such as turning points, supporting factors and belief participation.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

shows: during the transforming society, the conversion of people is a kind of variation with initiative and passive, rational and non-rational, willing and surpass. Therefore, I conclude that people's relig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have a logical and illogical relationship. It's actually misunderstanding to the people's spiritual word if we regard simply religious belief as trial and superstition. And we should evaluate it impersonal and promote the religion to be suitable for the socialism.

Keywords: Transformational Society; Religious belief; Christianity

引言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快速转型的关键期。许多国家的发展表明:这一时期既可能出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繁荣局面,也可能因社会矛盾高发而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在这个“不同阶层重新定位、权力重新分配与整合的博弈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迁、利益格局的变化”^①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等诸领域的变化引起了国民心理的急剧波动。比如,学者陆学艺认为:国民特别是弱势群体有了一种“被剥夺的感觉”,他们感到无所依托又无从选择。而与此同时,民众对宗教的兴趣和宗教皈依现象逐年增加,宗教有了一个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由于社会环境的宽松,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全面贯彻以及国家的安定繁荣,宗教在中国社会悄然复兴,不仅信教人数呈上升趋势,而且信教成员构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1999年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有1亿多人信仰宗教。而且,“在今天的宗教信徒中,已不再只是那些一步一叩的愚夫愚妇,而是云集了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和青年”。^②这些都表明宗教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因此,研究和考察转型期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不仅关系到理解社会现实、把握社会发展脉搏,达到社会的良性控制,而且关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人格精神架构。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本文试图探讨和回答两个问题:其一,面对传统社会、现代社会以及后现代社会诸种因素的多重冲击,中国一般民众在宗教信仰方面呈现出何种样态与质素?即转型期中国民众宗教信仰的特征分析。其二,中国民众宗教信仰与社会变迁存在何种关联?

本论文以宗教社会学的架构为主体,结合宗教心理学的研究路径,并尝试整合这两个领域。首先在阅读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社会转型相关概念予以厘清,进而揭示出转型社会背景下我国宗教变迁的趋势。在此基础上,以两个特定区域社会为研究对象,对转型期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状况进行实证研究,以揭示民众宗教信仰的特质及其与社会变迁的逻辑关联和非逻辑关联。

关于民众宗教信仰状况的探讨,西方国家的许多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论著和论文颇丰。比如德国古典社会学大师西美尔的《现代人与宗教》、卢克曼的《无形的宗教》等,不一而足。而自90年代以来,国内许多学者开始关注

^①李庆钧.霍布斯的秩序解说与转型期社会秩序的构建[J].社会学,2004,(3):11、12.

^②米寿江.当代视角下的宗教[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1.

社会转型与变迁对宗教的影响。如孟钟捷以墉栖基督教会为个案，折射出当代乡镇教会的现代困境：如何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型？又如何积极参与当地社会的转型？有的学者探讨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宗教问题（刘元春、曾文瑛、黄镇辉、李向平）以及宗教世俗化现象（冯丹、宫哲兵）。还有学者的研究涉及转型期中国民众宗教信仰原因探析（比如，马学琴《“宗教热”原因探析》）、信仰主体分类研究（如《社会转型期宗教信仰人群的类型与演变》）、特殊信仰人群研究（徐勇、孙嘉明《精神寄托还是理性选择——大学生宗教观调查》、买文兰《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村宗教的特点》等）、宗教心理研究（梁丽萍教授著作《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等领域。台湾学者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比如：辅仁大学宗教学系郑志明教授的《台湾民众宗教信仰的生死关怀与灵验性格》，刘怡宁、瞿海源的《尘世的付出，来世的福报——台湾社会中的宗教捐献现象》，姚丽香的《自力与他力之间——台湾民众宗教态度与行为间的差距》，台北大学社会系郭文般的《台湾宗教场域与宗教性的变迁》等对转型社会台湾民众宗教信仰状况进行了考察。其他的研究散见于论者的著作中，对我们认识转型社会民众的宗教信仰状况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第一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阐释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进入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快速转型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宗教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尤其是基督宗教的发展特别引人注目。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要研究转型期民众的宗教信仰必须首先厘清社会转型的相关概念与理论。

1.1 社会转型的内涵

对何谓社会转型加以界定，明晰中国社会转型的历程和特征，厘清这种剧烈的社会变迁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是研究转型期民众宗教信仰的理论基础。

1.1.1 社会转型的界定

关于“社会转型”的含义，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比如陆学艺、景天魁等社会学者认为，“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①。台湾学者金耀基认为中国

^①陆学艺、景天魁.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21.

社会转型是“从‘传统’转到现代、从身份转到契约、从神圣转到世俗、从农业转到工业、从特殊主义转到普遍主义、从功能普化转到功能专化”^①的转型。社会学者郑杭生则认为，“社会转型是整个社会系统由一种结构状态向另一种结构状态的过渡，它不是社会某个部分或层面的局部发展，而是社会系统的全面的、结构性的变化。社会转型以结构转换为核心，同时带动社会体制的转机、利益的调整和观念的变化等诸方面的发展。”^②学者姚南强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比较剧烈的社会变迁，是指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是社会发展中带有根本性变化的过程。^③总结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对社会转型应该从三个层面加以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指整个社会系统由一种结构状态向另一种结构状态的过渡。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比如郑杭生、李强等社会学者认为，“社会转型”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社会学术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④。从内容上看，我国目前的社会转型可从多方面加以描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从伦理型社会向法制型社会转型等。而从方式上看，社会转型有自下而上的自然演化型和自上而下的理性建构推动型两种方式，我国当代社会转型无疑属于后者。

1.1.2 中国社会转型的历程

可以说，二十世纪是中国急剧转型的世纪。以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新时期改革开放三次历史巨变为标志，中国社会开启了从传统全面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从 1911 年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早期阶段。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创建了民主共和政体。从此，我国进入了从经济到政治制度到思想意识、观念三个层面层层递进、步步深入而又交错重叠、难以区分的转型。

第二，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传统社会向社会

^①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71.

^②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30.

^③姚南强.宗教社会学[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4.215.

^④郑杭生,李强等.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45.

主义现代化社会转型。

第三,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中国社会推到了又一新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历史时期, 标志着中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场社会变迁以改变“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以政治运动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起点, 并经过十几年的“摸着石头过河”, 终于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纵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 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自发启动时期(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自觉推进时期(以 1992 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和全面加速时期(以建立和谐社会为标志)。我们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转型期定位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狭义含义的时间域, 来探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1.1.3 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征

当前我国社会经历的是一场复杂的整体性社会变迁, 由于这场变革发生在有 13 亿人口, 发展不平衡的社会主义中国, 所以极具复杂性和艰巨性。同时也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

第一, 中国社会转型具有整体性的特征。我国的社会转型是一种特定的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和整体性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 是质的意义上的社会整体嬗变, 因而是全方位的、全面的。这主要是因为社会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 其组成部分的任何一项改革都必然带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性质, 必然会引发其他相关领域的变动。比如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密切相关, 经济改革的成果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予以巩固和保障; 而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变动必然会反映在民众的意识领域, 体现在其行为上。因此, 社会转型从内容上看涵盖了经济、政治、意识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既包括整个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变迁, 也包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民众的转型, 即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总之, 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第二, 中国社会转型具有多元性或异质性。研究转型期而知名的学者雷格斯曾对世界各国转型期社会的阐述, 认为转型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异质性^①, 即不同性质的东西可以同时并存。经济学家胡鞍钢也认为,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越来越多元化、分散化的社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实质上是一个要实现现代化的过程, 但这一过程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既不具有共时性, 也不

^① F. W. Riggs. *The Ecolog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61. Chap. 2—3. 转引自金耀基. *从传统到现代*[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73.

是由自身因素所引发，是一种外生后发型现代化。这一事实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之间有一个很大的时间差，我们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已经完成甚至已经暴露出某种弊端并开始向后工业文明过渡时才开始实现的现代化。这种历史的错位就使得中国社会中既具有传统社会的农业文明，现代社会的工业文明的因素，也具有后工业文明的因子。三者 in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成为一种共时的存在。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时空中，“那种以人与自然的自然的和原始的合二为一为内涵的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精神，那种以人本精神和科学技术为内涵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以及以消解自我和压平价值、重建人与自然的人为合一为内涵的后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同时冲撞和挤压着中国民众的精神信仰世界。”^①由此导致了转型期中国民众价值观念上的多元性和模糊性，造成了其行为选择上无所适从或随心所欲的倾向，也带来了社会成员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同时，由于社会结构分化带来了利益的分化和重组，社会分层日益明显。也正是由于转型社会高度的异质性，任何一项措施、一种观念、一种制度都无法彻底贯彻，从而造成了形式主义的某种滥觞。对此，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甚至认为中国目前所处的转型社会是一个“断裂社会”，整个社会在社会意义上是分裂的，其不同的部分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他们之间也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

第三，中国社会转型具有不平衡性。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变化的转型阶段，一切都处于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动之中。可以说是一个旧的社会结构正在解体，而新的社会结构又尚未生成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各种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现象交织在一起：传统的，现代的，甚至某种程度的“后现代的”成分错综纠结，叠加在一起。这里有历史的因素，比如旧有的社会结构和承袭的文化传统；有地缘的因素，比如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在发展机会上的天然差别；有制度设计的因素，比如户籍制度造成的农村与城市的二元结构；也有现实政策的因素，比如经济特区等地区的优先发展等。此外，经济体制改革也先于政治体制改革。至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蹒跚而行。这一切都造成了社会转型的不平衡性。

1.1.4 社会转型与社会问题

社会转型往往带来价值观念、社会秩序、民众心理承受力的巨大震荡。观念混乱、心理脆弱、行为失范等一系列社会心理和行为问题层出不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成员之间贫富差距扩大与社会不公。社会转型必然会带来社会结构

^①http://www.newmind40.com/01_3/chj.htm 陈晏清 荆学明. 中国社会信仰的危机和重建.

的变化，社会群体的分化和重组以及群体利益的重新调整。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贫富分化现象已经产生，并且近 10 多年来个人收入差距不断加大。基尼系数已经达到 0.45，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披露：改革之初 1980 年，世界银行的估计是 33%，而目前已上升为 45.8%，而且“仍有可能低估了实际差距水平，一些高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通常会被大幅度低估甚至根本无法了解；一些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则往往被高估。比如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收入不仅总体上很低，而且其收入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必须用于生产性投入。”^①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达到或者超过 0.4，就说明贫富差距过大，而如果达到 0.6 则社会动乱随时可能出现。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中国社会出现了包括贫困者、失业者、残疾人、老年人等在内的弱势群体。由于弱势群体在经济上的低收入性和社会生活中的贫困性，使得他们在社会中的心理压力高于一般社会群体。“常有衣食之忧”，对生活前途悲观，有比较严重的相对剥夺感（这种相对剥夺感往往表现出一种晕轮效应，即放大效应）和较为强烈的受挫情绪，在社会生活中缺乏社会支持感，而“具有较低社会支持感的人对他人的评估比较消极，则对自己本身，则产生人际交往无能、焦虑及社会排拒感”^②。在心理上容易产生不满、苦闷、焦虑、急躁情绪，难以自我调适，进而容易对生活失去信心。

同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不少方面的制度存在漏洞，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够完善以及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意识的影响，导致当前腐败现象增多。而且“在目前中国的腐败现象中，危害最严重的有三种：一种是司法腐败，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第二种是教育腐败，如高校乱涨学费、高考招生舞弊等，它消减着无数社会弱者唯一追求向上的途径和信念，而且摧毁人们的心灵；第三种是医疗行业的腐败，是对社会弱者的生命和最后一滴血的蔑视甚至戕害。这三种腐败从社会文化、心理、道德、心灵上摧毁社会正义。”^③面对腐败现象，有些人能够很快做出调适，正确看待；而有些人则认为社会不公平，对社会的满意度下降，甚至对社会失望，在这种心理失衡的情况下，容易转向宗教寻求慰藉。

第二，社会转型往往带来社会焦虑。当前，为数不少的社会成员正陷入一种焦虑的状态之中，出现烦躁、压抑以及非理性冲动等紧张心理。而中国社会 20 年来发生的急剧变化是社会焦虑出现的重要原因。目前社会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

^① 葛延风.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社会学. 2001 年 8 月, 转引自姚南强. 宗教社会学[M]. 上海: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04. 217

^② 李强. 社会支持与个体心理健康[J]. 天津社会科学, 1998, (1)

^③ 人民网 www.people.com.cn 三种腐败现象危害社会正义

计划经济体制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过渡，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性的特征日益凸显，社会焦虑也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风险后果。社会的急剧变动，意味着社会成员原来所熟悉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大规模、急速的变动，这必定会出现大量的新事物、新观念、新的行为规范和新的规则。人们对这些新事物的认同需要经过一个时期，在此期间，社会成员对于新的社会环境往往存在着一种抗拒或认同的复杂心理状态。不少人对社会的未来前景没有十分的把握，难免出现焦虑心理。在各种社会群体中，尤其是那些社会弱势群体，不乏烦躁、压抑以及非理性冲动等紧张心理现象，他们在为眼前的生计和以后的出路着想时充满焦虑。另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充满了风险，个人的事情一般只能靠自己来解决。况且，很多必要的规范制度以及必不可少的“社会安全网”（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和健全。社会大众普遍对以后可能出现的不可预期处境心怀忧虑。在此情形下，社会焦虑有着明显的负面效应。

第三，社会转型容易带来人际关系淡漠，价值混乱和社会道德滑坡。改革开放以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唯利是图的思想流行于社会。经济利益的竞争使传统道德信条在新的游戏规则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社会道德呈滑坡态势。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充斥市场，社会陷入了诚信危机。与此同时人际关系在市场经济涌动的利益大潮面前也呈现出表面化、物质化、工具化的趋势。人情冷漠，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邻里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家庭中为财产反目等。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归属和爱的需要是人的五种基本需要之一。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使得这一需要得不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容易转向宗教寻求慰藉。与此同时，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众面对来自传统社会、现代社会以及后现代社会诸种因素的多重冲击，容易产生新旧价值观的冲突和混乱。比如，传统社会大公无私的道德教育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经济利益为本的价值取向的冲突，中国传统社会重集体轻个人与西方社会传入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冲突等。同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也容易出现社会失范现象。所谓社会失范，是指“社会规范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的模糊、混乱和趋于多元化的现象”。^①这是由于转型期社会结构不断的调整 and 分化，导致旧有的社会规范不断受到冲击而逐渐瓦解，新的社会规范体系有待于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而尚未建立，新旧社会规范的过渡期必然会导致较为明显的社会失范。

^①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132.

1. 2 社会转型与宗教变迁

宗教的变迁，固然与宗教本身具有的特性有直接关系。但宗教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发展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经说过：“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智化，总之是世界祛除巫魅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命运，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从公众生活中隐退——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越领域，或者直接流于直接人际关系的博爱。”^①人们常常把这个时代的理性化称之为世俗化。从近代开始，西方宗教开始了世俗化的历程；而现阶段中国社会的转型也对宗教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 2. 1 西方宗教的世俗化历程

从一般意义上讲，世俗化是指“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一种发展趋势和过程，相当于中世纪的政教合一，基督教在社会中的绝对统治地位，从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以来，经过产业革命、科技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西方社会，越来越摆脱了宗教的控制和制约，更注重理性和科学的这一历史变化。”^②尽管其间也有曲折和反复，但这一趋势正日益成为当代世界的潮流。

西方宗教的世俗化历程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起始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各国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有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和—一个强大的政府作为自己对外贸易竞争时的坚强后盾。因此，他们激烈反对封建割据，矛头直指教会，掀起了欧洲宗教改革运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成为世俗化进程中的先驱。他在反对教皇对世俗事务的垄断控制中提出，教皇的权力应当限于宗教事务，世俗事务应当归世俗政权管理。因此贝格尔认为，世俗化的最初载体是现代经济过程，即工业资本主义的运动，与工业生产过程的接近和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是造成世俗化的主要决定因素。并且断言：“无论其他因素的重要性有多大，还是新教为世俗化充当了历史上决定性的先锋。”^③十七、十八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启蒙思想的传播，世俗化从经济领域进入到政治领域。1787年，美国以国家宪章立法的形式，在世界历史上首次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规定宗教不能干预国家的行政事务。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确立了公共教育，改变了教会在教育中的作用。道德、教育从宗教中分化出来。进入20世纪，科学技术与现代经济的迅猛发展导致社会心理日益世俗化，世俗化成为现代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

关于世俗化的表现形式，贝格尔认为：西方教会中教会式的宗教性，即在主要

^① 马克斯·韦伯. 社会学文选[M].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6. 155. 转引自苏国勋. 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52.

^② 姚南强. 宗教社会学[M]. 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4. 219.

^③ [美] 贝格尔著. 高师宁译. 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53.

的基督教教会传统内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在现代社会已经走向衰亡。这在欧洲一般表现为体制参与上的衰退，即人们越来越少地参加崇拜仪式和采用圣礼等；而在美国则表现为参加活动的人数（根据教会成员人数的调查）一直在增加，但参与动机与传统动机相比已经大相径庭。“在今天，忠于教会强烈希望从罪和地狱之火中得到拯救的美国人已比较少了，而许多人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是为孩子提供道德教育和为其家庭生活提供指南，或者只是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特定社区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①。传统宗教性衰落，宗教产生了分化，即公共领域的修饰和私人领域的德行。当代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卢克曼（T. Luckmann）将欧洲和美国的世俗化分别称为“外在世俗化”（secularization from without）和“内在世俗化”（secularization from within）。这两种世俗化的共同特点是：传统宗教信仰不仅在大部分普通人眼中变得毫无意义，而且在许多无论其动机如何，仍然属于教会的人眼中也毫无意义了。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宗教已从“有形宗教”即以教会为制度基础的信仰体制转化为以个人虔信为基础的“无形宗教”。总之，西方社会宗教世俗化的特点是由制度宗教向个人宗教转化。

1.2.2 转型期中国宗教的变迁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其存在与发展都根源于社会存在，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按照宗教社会学的观点，现代人的宗教信仰是对与现代化相伴随的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种反映，当前的社会转型必然反映在宗教中。考察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宗教变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信教人数增多，信徒内部构成发生变化，分布呈现“两极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得在文革中受压抑的宗教信仰得以解放，信教人数显著增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约有一亿多宗教信仰者。虽然他们仅占到中国总人口的10%，但其绝对数字仍然很大。以基督宗教为例：到1949年解放前夕，天主教徒在我国只有二百多万，基督教徒只有七十多万^②。到1997年为止，中国有天主教徒400万人，基督新教徒约1000万人，增长了十数倍。^③而根据宗教部门的报道，目前全国基督教徒已经超过1500万，比建国初期增加了20多倍；拥有教堂16000多座，简易活动场所（聚会点）32000多处，其中新建礼拜堂和聚会点约占总数的70%，平均每天新增6所堂点；各级神学院所共18所，已毕业4000余人，受过培训的义工达51万人次；并有在海内外公开发行的基督教主要期刊《天风》和自己的

^①贝格尔著. 高师宁译. 天使的传言[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

^②李平晔. 中国宗教的历史特点及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 载. 基督宗教研究[M]. 269.

^③政府白皮书. 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997年10月17日.

印刷厂，1980年以来印发的《圣经》累计已达2800万册。^①

信徒内部构成也发生了变化。随着宗教的发展，传统信仰群体的“五多”（农村教徒多、老年教徒多、妇女教徒多、文盲教徒多、病残教徒多）现象有所改观，出现了年轻化、知识化的倾向，高级知识分子和学生逐年增多，特别是大学生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比如1998年，北京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九五”项目“北京青年宗教信仰状况调查及对策研究”显示，北京市大学生中明确表示有宗教信仰的占13.4%。^②陈安金在对温州大学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2000名大学生所进行的调查中，明确表示有宗教信仰的有400人，约占总数的20%。^③同时，在我国大中城市，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教师、法律工作者、职业经理人、医务工作者等知识分子也加入了信教的行列，宗教信徒已不再只是那些一步一叩的愚夫愚妇。

此外，宗教信徒在分布上还呈现出“两极性”，即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和一些贫困地区，宗教都有快速发展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穷算命，富烧香”的老话。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低而且发展很不平衡。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人们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与物质生产水平密切相关的教育、卫生、医疗等也相当落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就容易投身到宗教的怀抱。另外，在东南沿海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宗教活动也很兴盛。在这些地区，人们信教一方面是由于人的需要是多层次的，在物质生活富足后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更为迫切，而精神文明建设滞后不能满足其要求，于是投身于宗教；另一方面，经济虽然迅速发展起来，但是民众的素质并没有随之提高，观念意识和思维方式仍然是传统的。一些富裕起来的民众在变化莫测的市场经济中将自己的成功归于命运，希望始终保持有利地位，进而投身宗教以求庇护。而另外一些民众在无法理解由于市场变化、物价的涨落等造成的个人利益损失时，将之归结为“运气不好”。为了改善自己的命运，寻求好运气，发财致富，于是开始求神拜佛。

第二，在宗教组织形态上，由普化宗教向制度型宗教转移。在宗教组织形态上，杨庆坤先生在其著作《中国社会与宗教》中提出了“制度型宗教”与“扩散型宗教”这组概念，以解释中国宗教的独特性质。所谓制度型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是一种独立自在的宗教，具备了特有的宇宙观、崇拜仪式及专业化的神职人员，常常呈现出疏离于一般政治社会制度的特征。所谓扩散型宗教（diffused religion）

^① 段琪. 当代中国基督教概况及所面临的问题[J]. 世界宗教研究, 2003, (3). 转引自姚力.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发展的原因探析[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4, 第11卷, 第3期: 71.

^② 李素菊, 刘绮菲. 青年与“宗教热”[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0. 18.

^③ 陈安金. 当前大学生宗教信仰问题的思考[J]. 浙江海洋学院学报, 2000, (3): 72.

是指一种并不独立自在的宗教，其仪式、教义、神职人员，均已和其他的世俗制度如宗法、家庭、权力、政治混杂在一起，融合在其他世俗制度的概念、仪式或结构里。在这两个存在形式的张力之中，隐含着—个中国历史深层次之中运作自如的权力秩序，那就在制度化型宗教与扩散型宗教之间，后者常常享用前者所提供的符号、仪式或神职人员，将私人或个人的东西转化成为公共的东西；而前者则也将根据世俗社会的不同需要，常常借助于私人或个人的权力而体现为不同的社会形式，以左右世俗社会。中国民间宗教（或普化宗教，亦称泛化宗教）基本上属于一种扩散型宗教，它作为制度型宗教的特征并不突出，没有教义教规、组织团体和教职人员，主要是作为一种崇神的民俗渗透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甚至带有迷信色彩，比如算命、占卜、看风水等。同时，我国庞大的民间宗教信仰队伍也为系统宗教或制度性宗教提供了后备军。

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后，西方社会对理性工具主义和唯科学主义进行了批判，西方宗教相应地出现了世俗化、市场化、无形化、私人化、多元化的趋势，其特点是由制度宗教向个人宗教转化。与这一趋势相反，转型期中国社会宗教正经历着由民间宗教或普化宗教向制度型宗教的转移。比如，罗伟虹在《中国的民间信仰探讨》中指出：“从民间信仰转入系统宗教是宗教发展的一种趋势”。^①他认为，近年来基督教以其灵活简便、理论性强的特点占领了文革造成的信仰“空白”地带，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得到很大发展。这些信教者中大部分是从民间信仰转向宗教，其信仰的要求和目的并无改变。这种转向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第一，基督教教义不仅满足了民众求知的心理需要，而且赋予人生以意义，满足了民众对人生意义追寻的需要。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有物质需要，还有精神生活的需要。精神需要是人对社会精神生活及其产品的需求，包括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寻求、对知识的需要、对文化艺术的需要、对美的欣赏等。基督教对教徒很重视精神上的传教和道德上的约束，并通过频繁的礼拜仪式、读经团契和讲道见证加强这种信仰，这无疑能够逐渐提高信教者的层次，客观上满足其求知的需要。另一方面，确立一种值得人们追求的生活目标与意义则是人性中的一种基本取向。作为制度型宗教，基督教以其完备的教义为信众提供了人生意义。如基督教宣扬的原罪说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因为人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就对神犯了罪。人只要信神，就可以获得神的恩惠，就可以升入天堂，从此再无罪过。此外，基督教也为信众提供了神义论。所谓神义论，“就是根据社会中既定的法则，为那些必然会存在的、威胁到意义系统的无秩序

^① 罗伟虹. 中国的民间信仰探讨[J]. 社会科学, 1994, (8): 58.

现象提供意义的宗教性解释。”^①例如，关于受苦的神义论，可以帮助个体度过意义危机。第二，基督教的组织活动，满足了民众群体归属感的心理需要。基督教是一种“入世”的宗教，同时又是一种“普世宗教”，主张信徒不分民族、地位和性别，因此有着很强的社会整合力。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人是一种群居动物，有一种合群的倾向。合群需求心理即社会适应心理，它是指个体与群体成员和睦相处，与社会环境协调适应的心理，它能使个体在群体中获得安全感、归属感，从而满足全体生存的需要，并使个体在群体中获得自尊、自信，学会团结、友爱，从而满足个体情感的需要。在人的需要结构研究中，许多心理学家强调了人的合群的需要，比如马斯洛认为在人的生理和安全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交往需要成为人的核心需要，包括人际交往、对某群体或家庭的依赖以及友谊；美国心理学家大卫·麦克利兰（David McClelland）更明确地指出，在人的生存需要基本得到满足的前提下，人的最主要的需要就是成就需要、权利需要和合群需要。而基督教不仅具有很高的组织程度，而且更关注信徒之间的互动、分享和共融。基督教的宗教活动以每个礼拜天聚会为主，其中有唱诗、祷告、讲道。另外，有的地方还举行其它聚会，如祷告聚会，查经聚会等，既丰富了信徒的宗教生活，也满足了其归属感的心理需要。而民间宗教由于在“神学理论上是多神论的，在宗教实践上是实用性的”^②导致组织上的分散性，巫师、风水先生等“教职人员”与信众之间的关系也完全是松散的，只在信众有了某种现实的需要时，二者才发生联系，事情结束后便不再联系。

1.3 影响个人宗教信仰发生与发展的因素分析

转型期民众个体宗教信仰的发生，有着自己独特的规律。其宗教皈依行为，既受到生病、成长、进步、意义缺失等具体的世俗动机的影响，也与整个社会转型的大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

1.3.1 民众信仰宗教的个体动因

有学者认为，中国民众信仰的动机，从基于基本的生存需求，到精神上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寻，大都为今生现世的困惑所驱动，极少基于对来世的思考或追寻。^③民众信仰宗教大多是基于生病、成长、进步、意义缺失等世俗需要，其信教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家庭传统导致的信教。（2）疾病导致的信教。（3）家庭关系不合导致信教。（4）因生活道路坎坷导致信教。（5）因谋求一种超世的精神激励

^① 贝格尔著，高师宁译，神圣的帷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63.

^② [美]克里斯蒂安·乔基姆，中国的宗教精神[M]，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

^③ 李平晔，中国宗教的历史特点及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载，基督宗教研究，272.

和道德修养而导致信教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个体的差异性，我们不可能穷尽所有的信教原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民众信仰宗教的原因往往不是单一的，上述原因之间也不是泾渭分明、水火不容的，而常常是交织在一起，共同起作用。而且，民众在世俗动机的推动下接触到所信仰的宗教后，随着宗教参与的深入和对宗教教义理解的加深，往往不再满足于原来的世俗动机，转而追寻更高的精神境界，成为宗教的虔信者。

1.3.2 民众信仰宗教的社会原因

促使民众信仰宗教的因素不仅仅在于民众个体各异的世俗动因，更重要的是隐藏在这些世俗动因背后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宗教的产生和存在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自然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社会剧烈的发展变化，常常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宗教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还会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反过来使其认识论基础得到新的滋养。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大历史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所引发的社会阵痛，比如社会利益冲突加剧、贫富分化严重、社会心理严重不平衡、道德水准的滑坡以及贪污腐败现象等各种社会问题，都有可能成为宗教的发生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转型带来的心理阵痛是民众寻求宗教依归的内在动因。中国目前所处的社会转型阶段，既是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是社会冲突与矛盾增多，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与急剧变化的社会不相适应的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分化。激烈的社会竞争、日渐拉大的贫富差距、不时出现的下岗和失业等各种现象对早已习惯了旧的社会生活秩序的民众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面对贫富差距和生活压力，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心态出现了严重失衡。相对剥夺感、安全无助感、迷惘失落感，严重威胁着弱势群体的心理健康。而且置身于急剧变化的社会中，特别是市场经济本身的特性增大了的不确定性，使得社会成员容易产生一种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和担当风险的心理感受，造成了人们的社会焦虑。列宁说，“恐惧创造神。”^①宗教恰恰迎合了一部分人逃避现实、寻求心灵宁静的心理，是一个很好的避风港。

第二，世俗化导致的工具理性膨胀、个体价值虚无化为民众皈依宗教提供了信仰空间。今天的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而现代化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作为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结果，现代性使传统社会的一切神圣价值“脱魅”，促使人们的思维方式理性化，导致现代社会中一切行动都变成可计算、可预测的，并把功

^① [俄]列宁. 列宁选集[M]. 第二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379

能效率原则突显到极致。这种做法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推广开来，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达到目的的手段与目的本身之间的关系完全被从纯功利上加以考量，即从目的对追求目的的人“有利”以及对达到目的“有利”的观点上考量，韦伯称之为“形式合理性”。形式上的合理性与实质上的非理性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换言之，突显功能效率精神是现代社会的合理之处，而不合理之处在于把功能效率这一本来属于手段的东西当作目的来追求。这就导致了转型期工具理性与人性的冲突和精神的虚无。而转型社会中所发生的社会规范、价值标准和行为方式等的变化，使社会在价值体系方面出现某种紊乱的状态，民众在行为选择上出现无所适从或随心所欲的倾向。这使社会成员之间难以形成必要的共识，进而难以建构普遍接受的观念与行为。社会的整合性遭受到某种侵蚀，从而呈现某种无序的状态。有学者认为，宗教意识的苏醒是虚无背景下的终极依托，“现代中国民间宗教意识的复苏，其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市场竞争体制下，大量个体存在面临日益边缘化和价值虚无化的威胁，于是寻求某种终极性的价值支撑就是他们现实的选择。”^①总之，世俗化导致的工具理性膨胀、个体价值虚无化为民众皈依宗教提供了信仰空间。

第三，道德滑坡、人际关系商品化带来的“情感沙漠”为民众信仰宗教提供了土壤；而社会贪污腐败现象是民众皈依宗教的催化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世俗化影响下的人们为了追求利益不择手段，甚至互相欺骗，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往日趋淡漠，以至人际关系商品化，实用主义化和机会主义化。结果导致社会道德严重滑坡，社会诚信丧失殆尽。社会变成了伦理的沙漠，呈现严重的伦理危机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宗教组织中教友之间亲密友善的关系，毫无功利色彩的互相关心和真诚帮助，就显得弥足珍贵，充满了亲和力和诱惑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腐败现象也开始滋生蔓延，渗透到了各个领域。上至政府高官，下至乡村领导，腐败已经成为中国官僚制度体系的疾患。彻底惩治腐败、净化社会风气已经成为民众的最大希望。腐败现象使社会成员寻求正当途径满足其合理要求的诉求受阻，社会成员的希望极易转变为失望，甚至绝望，进而寻找解脱之路。有学者调查发现：“宗教的发展，与一个地区、部门和单位的党风有着密切的关系。党风好，宗教的发展就相对缓慢、迟滞，反之，宗教就蔓延得快，发展的猛。”^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贪污腐败现象是民众皈依宗教的催化剂。

^① 樊志辉. 大众文化的兴起与宗教意识的苏醒. 载《中国宗教学》第一辑. 中国宗教学会秘书处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 178

^② 贾玉斌. 当前宗教快速发展的原因及对策[J]. 党政干部学刊, 2004, (8): 17.

第二章 民众宗教信仰的实证研究

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全国宗教工作重点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五种宗教。根据山西省民族宗教事务局 2001 年统计，全省有信教群众 112 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3.5%。其中，佛教徒 37 万多人，道教 3 万多人，伊斯兰教 8 万多人，天主教 22 万多人，基督教 41 万多人。宗教教职人员 6035 人，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 1527 处。全省 11 个地市 119 个县（市、区）基本上都有宗教工作任务，其中 73 个县（市、区）为宗教工作重点县。

2.1 实证研究的基本材料

本论文选取了山西省两个区域社会作为研究样本，一为太原市天主教沙沟堂区，一为太谷区域社会。^①

2.1.1 太原市天主教沙沟堂区

沙沟堂区位于山西太原西南郊区的沙沟村，有一座与公路相邻，交通便利的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教堂。堂区共有信众 3000 余人，以沙沟村民为主体，约 2000 余人（约占沙沟村总人数的 80%）。其他教徒则来自沙沟周边地区：太纺、大众、下元、义井、磷肥厂等。堂区有神父两名，分别担任堂区主任和堂区副主任，主持各种宗教仪式和活动：负责周一到周五早晚两次弥撒以及周末的弥撒活动，给教徒讲解《圣经》、组织教徒外出传福音、暑假举办少儿要理班、朝圣等活动。

本研究之所以选取沙沟堂区作为研究的个案，是因为它地处城市与农村的结合点。透过沙沟堂区，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国农村民众宗教认同的情况，也可以看到城市民众皈依宗教的心路历程，有一定的代表性。本研究抽取了 10 名教徒作为访谈对象。从访谈对象的整体情况来看，受访的天主教教徒中，男性 4 人，占 40%，女性 6 人，占 60%；居住于城市的教徒 5 人，占 50%，居住于农村的教徒 5 人，占 50%；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教徒 5 人，占 50%，具有高中学历的 2 人，占 20%，初中文化程度的教徒 2 人，占 20%，小学文化程度的 1 人，占 10%。

^① 说明：本论文中基督宗教指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基督教徒指新教徒；基督宗教徒指天主教徒和基督新教徒。

受访对象基本资料

受访者	性别	年龄(岁)	居住地	职业	文化程度	皈依年限
天主教徒 A	女	32	农村	个体	初中	4 年
天主教徒 B	女	52	城市	工人	小学	1 年
天主教徒 C	女	68	城市	小学教师	大专	68 年
天主教徒 D	女	33	城市	邮递员	职高	3 个月
天主教徒 E	女	24	农村	家庭主妇	大专	24 年
天主教徒 F	男	20	农村	学生	幼师	20 年
天主教徒 G	男	32	农村	工人	高中	32 年
天主教徒 H	女	34	农村	打工	初中	34 年
天主教徒 I	男	63	城市	中学教师	师范	63 年
天主教徒 J	男	24	城市	护士	大专	5 年

2.1.2 太谷区域社会

太谷县地处山西省晋中盆地，宗教历史悠久。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五大教派一应俱全，境内大小寺庙、楼阁 250 多处，基本遍及全县所有乡村。根据太谷县委统战部 2003 年统计，共有教徒 5000 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1.4%（信教群众大约有 25000 人）；宗教活动场所 9 处，除此之外还成立了佛教协会、天主教爱国会、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以及基督教协会等宗教团体。而在 80 年代末期，太谷仅有教徒 500 多人，十几年间增加了十倍。从教徒的组成来看，由过去的“三多”（老年人多、家庭妇女多、文盲半文盲多）转变为“五增”（年轻人增多、干部职工增多、干部家属增多、文化高的增多、工商企业的增多）。^①本研究抽取了 8 名教徒作为访谈对象（“受访对象基本资料”见下表）。从访谈对象的整体资料来看，受访的教徒中，男性 3 人，女性 5 人，分别占访谈人数的 37.5% 和 62.5%；居住于城镇和农村的教徒各 4 人，分别占 50%；具有高中学历或相当于高中学历的 1 人，占 12.5%，初中文化程度的教徒 5 人，占 62.5%，小学文化程度的 2 人，占 25%。从年龄来看，30~39 之间的教徒 2 人，占 25%，50~59 岁之间的教徒 3 人，占 37.5%，60 岁以上的教徒 3 人，占 37.5%。

^①太谷县委统战部. 关于宗教工作的基本政策、方针、任务和我县宗教的基本情况；掌握新特点 研究新思路：对太谷宗教活动的调查与思考。

受访对象基本资料

受访者	性别	年龄	居住地	职业	文化程度	皈依年限
基督教徒 A	男	50	城镇	个体经营	初中	9 年
基督教徒 B	女	32	城镇	下岗职工	初中	8 年
基督教徒 C	女	50	城镇	退休工人	初中	8 年
基督教徒 D	女	86	城镇	退休教师	中师	64 年
基督教徒 E	女	32	农村	农民	初中	1 年
基督教徒 F	女	68	农村	农民	小学	60 年
天主教徒 K	男	80	农村	农民	初中	80 年
天主教徒 L	男	52	农村	农民	高小	52

2.2 实证研究结果呈现

本论文以太原市天主教沙沟堂区和太谷区域社会中的基督宗教徒为研究对象，通过个案访谈对其接触所信仰宗教的途径、信仰宗教的原因以及皈依宗教的支持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揭示当前民众宗教信仰的规律。

2.2.1 民众宗教信仰的契机

民众宗教信仰的契机是指教徒在皈依所信仰的宗教时所处的生命状态，是处于一种平顺、正常的状态还是一种非正常的危机状态。这种危机可能来自生理方面，也可能是经济方面、情感方面、心理方面。如身体的疾病、人际关系的紧张、家庭的不和等。

第一，非正常的危机状态之下接触宗教信仰。在受访的 18 名教徒中，明确表示自己是在一种非正常的危机状态之下接触宗教信仰的有 7 位。他们分别是天主教徒 A、天主教徒 B、天主教徒 J、基督教徒 A、基督教徒 B、基督教徒 D、基督教徒 E。天主教徒 A 与丈夫一起在沙沟租房从事个体经营，但是由于丈夫脾气不好，二人总是生气、吵架。而天主教徒 A 又性格内向，凡事都憋在心里，终于又一次大吵之后，她想不开喝安眠药自杀，好在被及时发现送往医院，被医生抢救回来之后，仍然是要寻死，找寻不到心灵的寄托，在这种情况下，房东教徒的规劝其加入天主教，她很快对天主教产生了认同感。天主教徒 B 是在自己双目突然失明，心情暗淡的情况下由邻居教友导引下接触天主教的，每天去教堂，当时她心情压抑，在听到教堂唱圣歌、念经声时，觉得心里非常欢喜，又体验到教友的爱和温暖，从而产生了认同感；天主教徒 J 是在父母十几年争吵不休、热战加冷战的家庭中长大，心灵备受摧残，

并且是在最近的一次争吵导致家庭有可能解体的情况下接触天主教的。在教友的规劝下，家庭关系好转，于是很快对天主教产生认同。基督教徒 A 是在自己经营的工程队不景气的情况下，为了摆脱困境，开始了追寻宗教的历程。基督教徒 B 是在自己对父亲心怀怨恨，不满意工作，还为个人问题伤心的情况下，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教会。基督教徒 D 是在教堂避难，生病却无法医治时接触到宗教的。基督教徒 E 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情况：

“由于我很要强、心眼窄而且还爱钻牛角尖，一遇事就发脾气，斤斤计较，家庭中充满了火药味。去年五月初五从地里回来，得了一种怪病，神经不由使唤，就如疯了一样。父母认为是跟了“东西”，到处求“神”，结果一处说一个样，没几天又犯病了。我婆婆说，让你婶婶（孙玉瑞）给你祷告祷告吧。我也是得病乱求医，就跑去让我婶婶给祷告。当时我婶说：“你要真心相信，才能得救”。当时我嘴上说相信，可心里却半信半疑，给了我《圣经》却头疼是不能看，只好又送回去。后来，又去医院检查，医院说是心细、遇事想不开、神经着了凉造成的。告诉我丈夫说不要让我着急上火、生气，还给我开了一堆调节神经的药，说回去慢慢调养。可是病人心情总是不好，自己就把自己气出病来了，又得去医院。这样翻来覆去三四回，身体软弱无力，记忆力也减退了。直到去年腊月，爱兰姑又给我传福音，我才信了主。”

第二，在环境的熏陶下平顺地接触到宗教。处于这种情形下的有 11 位，主要是天主教徒（9 位），还有基督教徒 C 和基督教徒 F。基督教徒 C 是 1995 年开始接触信仰，1996 年受洗。她说：“‘他要救你，他要救我；只要信他，只要信他，现在要信他’，这句话深深打动了，当时就流下了感动的泪。不来教堂不行，不由自己”。基督教徒 F 当时正在家绣花，忽然听到有唱歌的声音，于是去问邻居声音的来源。邻居讲：今天是周日，歌声有可能是从教堂传过来的，但这里哪能听到从教堂传来的声音呢？我们都没有听到，你是怎么听到的？清楚了声音的来源，于是基督教徒 F 就来到教堂……

2.2.2 宗教皈依的支持因素

宗教皈依（Conversion）作为个人在信仰中的变化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制度性的信仰认同，它通过接受某种特定的宗教仪式而对自我进行重新定位，是非宗教信徒或其他宗教信徒转变为特定宗教信徒的过程。它意味着皈依者在信念、态度、价值观和行为各个方面全面的转型。就基督宗教而言，皈依后的洗礼（baptism）是基督徒最基本的入会仪式。本研究的 18 位受访者，虽然有或长或短、或深或浅的犹豫，但都接受了洗礼，在神人面前宣布自己要决心信主和加入基督教会。基督教中上帝被认为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罪人身上做工，使他们皈依基督。在这个意义上，

不同的基督信徒有不同的皈依历程，但是每一个宗教徒皈依的决定都是自己做出的、旁人无法替代的抉择，它意味着对上帝的敬畏感之下的一种承诺。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其做出这样的抉择？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在宗教徒的皈依中，神秘体验的感召、信众团体归属感的认同、宗教教义本身的说服力以及在信仰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等几个方面的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是民众宗教皈依的动力所在。

第一，神秘体验的感召。本研究发现，几乎每个信徒都历数“神迹”，以此来证明基督教信仰“管用”，宗教的应许变成了现实。天主教徒 B 谈起自己的神秘体验滔滔不绝：女儿毕业后一直没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一次在教堂做弥撒时便祈祷，请求天主赐给女儿一份工作。果不其然，祈祷过后没几天女儿就找到了一份工作；还有自从失明后，每天晚上做梦都是有关煤炭的，于是就想：我每天白天在黑暗的世界里生活，什么也看不见，晚上做梦也是黑洞洞的，太不公平了！于是便向天主祈求改变梦的颜色，令她高兴的是，这个愿望也实现了。这些“神迹”使她更为认同自己的信仰。天主教徒 D 的神秘体验是三个梦：第一个梦天主教徒 D 认为很奇怪，竟然梦见沙沟教堂对面的大门像古城门一样缓缓打开，并露出了耶稣慈祥的面容（据其他教徒讲，这是天主在召叫）；第二次是晚上做噩梦，梦见窗外站着一个长着红头发、蓝绿眼睛的魔鬼，正当她害怕之时，窗外又出现了一个长着翅膀的男士，魔鬼就不见了。（按照天主教教义，每个人都有一个守护天使，所以其他信徒解释说是守护天使在救护她）；第三个梦发生在天主教徒 D 决定领洗的前三天晚上，梦中有不知名之物以大把的钞票相诱，不让她领洗，在她快要动心之际，护守天使及时出现，赶走了该物。（据神父讲，这是魔鬼的诱惑）。天主教徒 D 说她感觉到天主真的在召唤她，于是很快皈依。天主教徒 J 是在教友的劝说下全家去阳曲县板泉山圣母堂朝拜时，在当时并没有打雷闪电的情况下，摄像机镜头里出现了圣母像一亮一暗的“圣迹”。更为奇特的是，接触天主教后，原本吵闹不休的家庭和睦了许多。这一切促使深受家庭不睦之苦的教徒 J 与家人一同皈依。

基督教徒 A 和基督教徒 D 二人也遭遇了奇迹。基督教徒 A 早在 1995 年时由于企业（经营一家工程队）不景气，为了摆脱困境，开始研究周易、八卦、奇门遁甲、算命等，并为此购置了价值大约为三、四万元的相关书籍。当时妻子已信基督教，并劝其也信但他没有接受妻子的劝说。事情发生转机是由于工地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一天，工地上有一木工遭电击，赶快送到医院急救，但是情况很危急，氧气也输不进去，其妻知道后在家不停地祷告，结果令医生惊奇的是该濒危木工醒了过来而且安然无恙，进出医院共花了 15 分钟。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徒 A 烧毁了

周易等书，开始信教，之后便正式受洗。基督教徒 D 也是在发生了奇迹之后皈依基督教的，下面是她的讲述：

“我年轻时参加了革命，因为怀孕为了躲避日本人在教会避难，举目无亲，生了病也不能出去看，很是艰难。当时就有教友劝我皈依，但是我信不进去。那么病怎么办？教友就劝我不妨试一试通过祷告治病。万般无奈之下，我就开始了祷告：如果你是真神，就请治好我的病，我就信你……在祷告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异象，在宽阔的大地上有两条道路（后来教友解释说：这两条路，一条是永生之路，一条是灭亡之路），还有许许多多的鞋，男人的鞋、女人的鞋，透过拥挤的人群我看到了耶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祷告之后，我的病完全好了，这一切使我不得不信。”

第二，信众团体的归属感。比如天主教徒 A 是在因家庭不和而自杀未遂的情况下接触天主教的。在教会，她说自己不仅得到了教友热情的帮助，而且深受教会中大家都是兄弟姊妹的浓厚的人情味的感染，不论职业贫富大家都一律平等的观念也异于世俗社会事实上存在的等级观念。这一切使她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归属感，心灵有了依托，相应地也对天主教产生了好感和认同。天主教徒 B 是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接触天主教的，当时她是在教友的搀扶下参加了一位神父的上任仪式。当听到教堂里唱圣歌时，天主教徒 B 说自己心里忽然满怀喜悦，久病以来第一次感到开心；吃饭的时候，教友们对她更是备加照顾，第一碗饭是端给她的，夹菜看不见，有教友就一口一口地喂她。天主教徒 B 说她当时就想：除了我父母对我这样好以外，还有谁能这样对我？我一定要加入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第三，对教义的认同及宗教仪式所激发的生命感动。根据访谈资料，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基督新教徒，在其信仰的心路历程中，都有一个对教义逐步认同的过程。这种认同在促使其做出皈依抉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随着对教义理解的加深，又进一步加强了其对所信仰宗教的信仰。天主教徒 C 和天主教徒 I 都是退休教师，在教会负责沙沟堂区向外“传福音”的工作。天主教徒 C 谈到，按照天主教教义，教徒皈依之前要经过考验，包括对教义的理解。因此，她除了出去传教外，还定期在家举办“分享会”、学《圣经》等，说要人“明明白白信教，知道我们不是邪教，不要信了之后觉得上当了”。比如天主教徒 A 在皈依的过程中，不仅积极参加“分享会”，而且阅读了大量的宗教书籍，加深了对教义的认识，还在本堂区办的报纸上发表了文章。教徒 I 除了传教外，每年暑假还负责给少年儿童讲解宗教要理，从小培养教徒对教义的认同感。基督教徒 B 谈到：第一次来到教会是参加祈祷会，当时大家正在唱《恩友歌》，一下子就觉得这首歌是专门为我而写，于是感动的不断地流眼泪，觉得每一个字都打动了心灵。并在访谈过程中给大家唱了起来：

《恩友歌》

何等恩友慈仁救主，负我罪孽担我忧？何等权利能将万事，来到耶稣座前求！多少平安我们坐失，多少痛苦冤枉受，因为都未将万事，来到耶稣座前求。

我们有无试探引诱？有无难过苦关头？决不应当因此灰心，仍当到主座前求！何处能寻这般良友，同尝一切苦与愁？我们弱点主都知道，放心到主座前求。

我们是否软弱多愁，千斤重担压肩头？主仍做我避难处所，奔向耶稣座前求！你若真逢友叛亲离，好向耶稣座前求？到他怀中他必保护，有他安慰便无忧。

基督教徒 B 很快就接受了信仰，成为一名正式的基督徒。基督教徒 C 认为有一句话深深打动了她，——“他要救你，他要救我；只要信他，只要信他，现在要信他”——当时就流下了感动的泪，不来教堂不行，不由自己。基督教徒 E 称自己被以弗书 1：1/14 节的经文深深打动了，其中 4~5 节经文印在了脑海中：“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是名分。”基督教徒 F 在教堂听牧师布道时，觉得“说到自己心里去了，不断地流眼泪”，牧师注意到她，邀请她坐到里面，于是就信了。这种由教义或教会音乐激发的生命感动导致的信仰既有非理性的情感，对于不信教的人来说是很难体会和理解，但对教徒而言，却是发自内心的，实实在在的。

第四，个人的成长，包括身心健康和道德升华。比如天主教徒 A 说，信教之后，自己的性格由内向变得开朗了许多，原本紧张的家庭关系得到改善，丈夫说她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天主教徒 B 心情舒畅了，丈夫的病也好了；天主教徒 I 说生活更加充实，充满了喜悦和快乐；天主教徒 J 说信教后家里由“地狱变成了天堂”，自己的性格也不像以前那么粗鲁了；天主教徒 H 觉得自己的人际关系处理得好多了。基督教徒 A 说自己在性格方面原来火性大（被称为“红砖头），谁也奈何不得，现在脾气好多了，爆发的次数也少了，忍耐力强了。现在还未达到能够完全忍耐的境界，所以以“忍耐、饶恕、爱仇敌、无仇敌”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基督教徒 B 说上帝让以前爱慕虚荣的自己，从此以后能踏踏实实地走路。基督教徒 D 是退休教师，今年 86 岁了，身体很好，耳不聋眼不花，能够自己照料自己，脑子很清楚，还自己做饭吃，儿子动员回家享福也不去。基督教徒 E 欣喜地告诉我们，说信主以后，身上的病渐渐减轻，精神状况好了，不记恨人了，学会了饶恕人，最可喜的是记忆力恢复了。三八妇女节，去乡里参加妇女知识竞赛，还获得了第三名。家庭和睦、人际关系和谐。基督教徒 C 认为，周围人们没有出现因为是教徒而疏远的现象，他们反而

更喜欢和她谈话。天主教徒 K、天主教徒 L 认为，信教家庭一般比较稳定、和睦，很少有打架、离婚现象，因为教义讲忍耐、爱、互相尊重。

经济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天主教徒 C 认为自己即使在“文革”中也没有受太多的苦，下放后还被选为“先进”，家庭幸福、事业顺达，自己是校长，丈夫是总会计师；天主教徒 D 也谈到自己在工作中多次化险为夷；基督教徒 A 认为自己在信教之后，生意比以前好多了，工程队规模扩大，现在有 100 多人。基督教徒 B 家养车，她觉得信教后跑车有了依靠，而且有信仰的养车人与没有信仰的养车人不同，她说：“有一次，一个外地朋友（没有信仰的养车人）被罚款罚光了需要借钱；而自己家正月里出车因钱不够需要借钱时，我们祷告上帝，结果业主意外地先给了几千块钱，于是不用借钱了。信了上帝真的很奇妙，神是生命中随时的帮助。”

道德自律意识增强。基督教徒 A 说自己在信教之前，赚钱靠偷工减料。信教之后，不仅保证工程质量，甚至贷款发工资，不克扣工人，也不再偷工减料，办事情没有了后顾之忧，讲信誉。基督教徒 C 说自己挨了“两鞭子”：1996 年 8 月受洗后不久，觉得灵里发生了改变。有一次去买菜，顺手牵羊拿了一个茄子，这是不讨神喜欢的事情：“我是圣洁的，你们也应是圣洁的”。到中午时分，腰开始疼了起来，而且越来越疼，甚至连中午饭都不能做了，弯腰提壶时突然跌倒。因为怕可能导致瘫痪，赶快去医院看病，在路上再次突然跌倒。但是在医院检查过后却没有发现问题，医生说没事。心里觉得很奇怪，疼的这样厉害却没事？这时神在心里做了功：教内有一兄弟曾讲过，人有病是犯罪引起的，中午正好吃的是早上偷来的那个茄子！于是赶快祷告，以期得到赦免。你是神的儿女，是神所爱的，要受到管教，我亲身体会到神“两鞭子”的管教，从此以后，信仰更加坚定也不犯罪了。世上有律法仍有犯罪，但上帝的管教比律法更管用。第二天坚持去做神所喜悦的事，两三天没吃药就好了。从此也不再打麻将了。由此可以看出信教后教徒对自己加强了约束，自律意识增强。

这些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变化也成为宗教徒皈依和维持宗教信仰的动力。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以上促使教徒皈依的因素通常情况下并不是单独起作用的，它们往往交织在一起，共同发挥影响力。当然，这其中也有个别非常突出的因素起了关键的作用。以天主教徒 J 为例，他是在人际关系的动员、神秘体验的感召和对教义的认同共同影响的情况下发生的皈依。其中，神秘体验的感召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再如天主教徒 B 是在人际关系的动员、对信众团体归属感的认同以及宗教体验事件共同作用下的皈依行为，信众团体爱的吸引力是促使其皈依的重要因素。

2.2.3 信仰参与

从我们的实地参与和深入访谈中得知，阅读圣经和祷告，是基督宗教徒基本的行为元素。它们不但是基督宗教徒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渗透在基督宗教徒的宗教群体生活中，或团契中。此外，宗教徒的传教行为及其对宗教组织的捐助活动，也被视为个人虔信宗教的象征。

第一，日常的祈祷活动。没有什么东西比祈祷更能区别信教的人和不信教的人了。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把它称之为“宗教的神魂、精髓”、“宗教的核心”^①从访谈资料来看，大部分教徒都表示能够做到本宗教要求的祈祷或类似活动。比如基督教徒 A 每日按读经表进度读《圣经》，按照早上灵修→读经→讲经→晚上温习的程序每天坚持。基督教徒 B 说自己每天读圣经，就好象每天吃粮食，灵魂也是如此，要每天吃粮食。几乎所有的天主教教徒都表示自己每天做早课、晚课（祈祷），饭前感谢“天主赐我食”。当被问及如果早上没有时间祈祷时，天主教徒 F 说可以在上学的路上祈祷，天主教徒 J 也谈到在下班的路上边骑车边念经祈祷的情形。在到教堂参加弥撒等宗教仪式方面，几乎所有的教徒都表示愿意来教堂，至少每周一次。天主教徒 I 分管“圣物组”（爱德服务中心），几乎每天都去教堂；天主教徒 J 说，再忙也要抽时间去教堂，朝拜天主；天主教徒 F 说，教堂是专门祈祷的地方，可以“和天主面对面，心对心地交谈”。

第二，传教行为。从访谈资料来看，广泛传教的有天主教徒 A、天主教徒 B、天主教徒 C、天主教徒 I；天主教徒 F 在同学中传教；天主教徒 H 在邻居及单位同事中传教；从不传教可很少传教的有天主教徒 D、天主教徒 E、天主教徒 G 及天主教徒 J。相比较而言，文化程度较高的天主教徒如天主教徒 D、天主教徒 E 和天主教徒 J 很少传教。基督教徒 A 是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会长，但他说自己从不在工作中传教；基督教徒 B 还担任教会的义工（指在教会讲道的非专职人员），每周三次到各个村或各个点去讲道，广泛传教。基督教徒 C 也传教；基督教徒 D 文革后落实政策不久，第一个回到了教会，迄今为止一直住在教会。虽 86 岁高龄，但现在还传教，她认为自己得了好处也要告诉别人。

第三，对宗教组织的捐助活动。从访谈的资料来看，几乎所有的教徒都表示对教会有过“奉献”，数量多少、形式不同。但却是自觉自愿的，有捐钱的，也有替教会工作的。比如天主教徒 A 对教会不仅有捐钱行为，而且希望将来能捐钱修教堂；天主教徒 D 主动打扫教堂等。

^①威廉·詹姆士著，唐钺译. 宗教经验之种种——人性之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460—472.

2.3 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当前中国民众宗教信仰的三大特征：

第一，转型期民众接触和皈依宗教的过程是一个主动与被动的双重变奏。所谓被动指的是中国民众在接触宗教信仰的过程中体现出被动性的特质，即在某一个特定的机缘下被宗教找寻到，而非民众自己主动追寻的结果。但同时，中国民众对所接触的宗教并不是盲目地接受并且皈依，而是有一个主动抉择的过程，皈依过程中的波折也深刻地表明了这一点。

在西方宗教研究中，多数学者认为，只有少数人的宗教信仰是在经过一番研究和慎思之后，通过有意识的追求而获得的。的确，本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这一观点。以天主教徒为例，众所周知，天主教是一种家族式宗教，但其信徒又有世袭教徒和非世袭教徒之分：前者是指继承了家族或者父母的信仰、在家人的带领下出生后 8 日内受洗的教徒（他们从小跟随父母家人参加宗教活动，学习教义，比如天主教徒 C、天主教徒 D、天主教徒 E、天主教徒 F、天主教徒 G、天主教徒 H、天主教徒 I、天主教徒 K 和天主教徒 L）；后者是指原本不信仰宗教或信仰其他宗教，后来在生命的某个时期由于多种契机皈依了所信仰的宗教（比如个案访谈资料中的天主教徒 A、天主教徒 B、天主教徒 D 和天主教徒 J 都是如此）。天主教信徒以前者为主，这就使得天主教教徒的皈依多以程式化皈依为主。程式化皈依 (Programmed conversion) 的术语是由奥茨 (Oates) 创造的，在这里，皈依实际上变成了一种仪式。但无论是世袭教徒还是非世袭教徒，均受到了人际关系的导引。顾名思义，人际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亲属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同事关系等等。对于世袭教徒而言，其接触并皈依所信仰的宗教多受家族代际之间人际关系的导引，一出生就被动接触到所信仰的宗教因为天主教自身的特点，即代代相传的家族式宗教，从小就生活在宗教家庭里，耳濡目染，自然接触到所信仰的宗教。在家人的劝说下皈依，并在日后的信仰生活中日积月累，找寻到人生的意义和归属感；而非世袭教徒则多受朋友、邻居、同事、家庭成员等人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是在其生命中某个痛苦、焦虑的时刻，身为教徒的朋友或其他人际关系便会主动上门劝其入教。而且从访谈材料来看，即使那些明确显示自己是在一种非正常的危机状态下接触所信仰宗教的教徒，也并非生活中出现危机事件后去向宗教求助。事实上，她们是在周围人际网络导引下由于生命危机事件的压力而使这样一个过程迅速完成。比如天主教徒 A、天主教徒 B、天主教徒 J 这三位异“世袭教徒”在皈依所信仰

的宗教之前，都受到了周围朋友、邻居等人际关系的动员。其中，天主教徒 A 和天主教徒 B 受到邻居教友的鼓励和动员，天主教徒 J 则是全家受到父亲朋友的规劝才接触进而皈依天主教的。根据访谈材料，由家庭成员之间的影响而接触宗教信仰的还有基督教徒 A、基督教徒 B、基督教徒 C、基督教徒 E。基督教徒 A 的妻子已是教徒，她曾经劝说丈夫也信，虽然当时基督教徒 A 以“中国的神也是神，外国的神也是神，为什么不信中国的神而要信外国的神呢？”加以拒绝，但是他还是接触到了日后将要信仰的宗教。基督教徒 B 是在母亲和妹妹都已经皈依并劝她也入教的情况下接触所信仰的宗教的；基督教徒 C 和基督教徒 E 分别是在姐姐和婶婶的引领下对所信仰的宗教有所了解的。因此，中国民众在接触宗教信仰的过程中呈现出被动性的特质。而这并不符合宗教社会学家约翰·罗弗兰德（Lofland, John）在上世纪 60 年代提出的皈依模型（通常称为 Doomsday Model）。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宗教徒在“紧张经验的持续”中，并未“浸淫在宗教倾向的问题解决观点里”成为所谓的“宗教追寻者”（religious seeker），而更多的是在人际关系的导引下被动地接受宗教解决方案的尝试。^①

但是，宗教徒被动地接触所信仰的宗教并不表示其必然皈依这一宗教。宗教徒的皈依依然要看心灵对宗教的独特的判断与感受，而这无疑是一个主动选择的过程，并非是“傻子遇到骗子”的结果。从访谈材料来看，民众往往是在接触到所信仰的宗教之后经历一定的时间才做出皈依的决定。比如天主教徒 A 是在接触天主教一年左右后才正式受洗，基督教徒 C 也是在接触基督信教一年后皈依。宗教心理学家理查德森（Richardson）提出“皈依生涯”（conversion career）的概念，他认为“皈依”不是一辈子一次的单一事件，而更可能是一连串的行为，这也就是要说明宗教信仰是一个主动追寻的历程，而这种主动追寻过程形成了当事人和宗教团体之间的相互选择，而非单方面的动员和影响。美国宗教社会学教授罗纳德·L·约翰斯通（Ronald L. Johnstone）在研究宗教个体宗教信仰成长的过程中，指出有必要区分两种人：一种是一生下来就能使宗教观念和宗教群体的实践内在化；另一种人是要在其生命的某个时期经受一种皈依的过程才能实现宗教信仰的内在化。并且约翰斯通认为，社会个体宗教内在化过程中最普遍的模式是：人们在某一特定的宗教环境中“成长为宗教信徒”。^②比如天主教徒 A，她在接触到天主教后参加了一次分享会，深受震动。回家后购买并阅读了大量的宗教书籍，还参加了教会暑期举办的少儿要

^①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1—23.

^②罗纳德·L·约翰斯通著.尹今黎、张蕾译.社会中的宗教——一种宗教社会学[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75.

理班，加深了对教义的认识，并且在本堂区办的报纸上发表了文章，最终受洗皈依。里查德森指出，只有肯定皈依过程中人的主动性，才能说明何以那些教育程度较高、经济地位较好者亦会成为宗教团体的成员，特别是那些智识型和实验型的（intellectual and experimental）皈依者更凸现了那些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良好者“决定成为宗教人”（choosing to be religious）是一种改变生命的主观决定。^①。斯达克（Rodney Stark）在其与罗杰尔·芬克（Roger Finks）合著的《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一书中，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了教徒在皈依过程中有明显的理性的介入，认为人们做宗教选择跟做其他选择采取的是同样的方式，即权衡利益和代价。本研究再现了这一结论：比如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天主教徒 B 在接触到天主教之前曾经遭遇过基督新教，但她也并不是碰到了什么就信了什么，而是在比较二者的基础上选择了天主教。除此之外，受访对象在决定皈依过程中产生的犹疑或踌躇等现象，更能彰显其主动选择的过程。由此可见，中国民众接触和皈依宗教的过程是一个被动与主动的双重变奏。

第二，转型期民众的宗教信仰是一个非理性与理性的二律背反。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的认识过程主要是理性思维的过程，同时又包含非理性因素的参与。理性因素主要是指人的理性直观、理性思维等能力，是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过程中的主要因素。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起主导作用；非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也具有一定的重要作用，它是指人的情感、意志，包括动机、欲望、信念、信仰、习惯和本能等，以非逻辑形式出现的幻想、想像、直觉和灵感等也属于非理性因素。非理性因素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指非理智、非认知的精神因素，不属于认识能力，而是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渗透到主体的认识活动中，包括情感、意志、欲望和需要等因素。后者指不能被逻辑思维的概念所包含的主体心理形式，如幻想、想像、猜测、顿悟、直觉和灵感等意识因素，这些因素同样不属于人的认识能力，具有不自觉、非逻辑性的特点。

所谓非理性是指在中国民众的宗教认同与维持的过程中，“神迹”或神秘体验作为一种非理智、非认知的精神因素，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神迹”和神秘体验在转型期民众的宗教信仰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美国宗教社会学家斯达克（Rodney Stark）将“神迹”定义为：“相信由神干预世俗事务所引起的合意的效果”；将神秘体验定义为“某种跟神接触的感觉，无论这种感觉如何短暂”，并且认为对于宗教解

^① Richardson, James T. "Studies of Conversion: Secularization or Re-enchantment?" pp.104~121 in Phillip E. Hammond(ed) *The Sacred in a Secular Ag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108,1985.转引自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3.

释的信心会随着“归功于宗教的神迹”和“人们有神秘体验”而增强。^①总结中外学者的研究,也可以发现国人的宗教观具有神秘主义的倾向。梁丽萍教授在其著作《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中发现,“几乎每一个宗教徒,不论佛教徒,抑或基督教徒;不论高文化群体,抑或低文化群体,都承认和肯定‘神迹’或特殊的‘感应事件’在其宗教认同中的作用”。^②美国宗教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在其著作《宗教经验之种种——人性之研究》中也肯定了神秘状态对于经验它的个人绝对有权威。同样,在研究中我们发现,访谈对象都非常注重神迹或神秘体验。研究发现:信徒大多历数神迹,以此来证明宗教“管用”(workes),宗教的应许变成了现实。比如天主教徒A与丈夫一起从事个体经营,信教后生活中发生了一些神迹,进货途中丢了一包价值750元的袜子,一般情况下是找不到了,但是她在家祈祷,结果找回了多半包;丈夫也接受了信仰,皈依天主教,脾气大变,像换了一个人。从小就信仰宗教的天主教徒C说自己在信仰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神迹:即使在文革中当了工人也没人小瞧,不仅工作中得到优待,而且还被选为“先进”;文革后第一次长工资就排上队;给儿子找媳妇不好找时,求主赐给一个,哪怕不是教徒也行,结果不久便如愿以偿,儿媳也很快皈依。她觉得这一切都是主恩赐的,因此工作勤奋出色,要为主作证,结果被提拔为副校长,同为教徒的丈夫也被任命为总设计师,可谓是事业顺达、家庭和睦。再如天主教徒D谈到自己接受信仰后在工作中多次化险为夷:由于工作需要骑自行车大街小巷地跑,有几次觉得是不可避免的危险却平安避开,当时眼睛一闭:“天主,交给您了!”有一次工作中遭遇困难,单位让推销纯净水,由于价位高于市场上同类商品的价格一直积压着。不料有一天当她走到某单位门口时,听到一神秘声音说:“你还不卖你的水?”于是,教徒D随口一问,该单位竟然将其所有纯净水全部买下。爱人在给叔叔送葬清洗遗体时怕得要命,闭上眼睛却意外地看到一个金光闪闪的十字架,一下子就不怕了;还有去阳曲县圣母堂,天降大雨,全身都湿透了,但无一人感冒和受伤。这些事情使教徒D更加认同所信仰的宗教。天主教徒E说:舅舅和舅母一同出车,不料出了车祸,但由于舅舅挂了圣牌,舅母未挂,结果舅舅只是一些皮外伤,而舅母则伤势严重。天主教徒J皈依后不久遭遇车祸,被车撞出两米远,经诊断只是轻微脑震荡;而在同一地点,几秒钟后又发生了一起车祸,一位老人被压死,教徒J觉得自己能死里逃生是“天主的恩赐”等。劳伦斯·扬(Young, Lawrence A)认为“宗

^① [美]罗德尼·斯达克 罗杰尔·芬克著,杨凤岗译.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35-136.

^② 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96.

教体验可能被理解为证明像上帝存在或墓后生命等不可观察的现实”，因此抵消了宗教应许中涉及的潜在风险。^①由此可见，“神迹”或神秘体验这种非理性因素在民众宗教信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而所谓理性是指在转型期民众的宗教信仰中，除了非理性的神秘体验之外，还有许多理性的因素即理性直观、理性思维等能力不容忽视。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和罗杰尔·芬克(Roger Finks)在其著作《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中认为，人在本质上是理性的动物，“在其信息和理解局限之内，在可行的选择的制约下，在其喜好和趣味的引导下，人们总是试图做理性选择。”，而且认为“宗教行为……是理性的行为，这就跟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②，有着明显的理性的介入。整合研究资料，我们发现，除“神迹”或特殊的感应外，教义的认同、危机事件的解决、心灵的改善与人格的升华、信仰团体所聚集的人情张力以及信徒之间的社群友谊也是人们皈依和维持信仰的重要力量。宗教社会学家劳伦斯·扬(Young, Lawrence A)主张将宗教经验的“本体”及其“过程”加以分离。他指出，宗教经验与宗教知识的本质是非理性的，但追求宗教经验的社会行动与过程则是理性的。宗教经验的价值在它被真实消费之前，是无法被个人所体验到的，而宗教经验的消费将会为个人带来宗教资本(religious capital)的拥有。这种宗教资本的存在形态，则是有关宗教经验的非理性知识(non-rational knowledge of religious experience)，也就是说有关宗教经验的知识只能以实际体验的方式获得。而一旦个人获得这种宗教资本之后，对于宗教经验的持续追求就变成是理性的。个人追求宗教经验，是因为宗教经验对个人来说是真实的、有功能的而且满足个人某种需要的，因此，个人愿意付出代价追求旁人看来不真实的宗教经验，乃是理性的行动，而其宗教认同是理性选择的结果。^③从访谈材料来看，信徒并不是一接触到所信仰的宗教就马上皈依，而是从接触到皈依往往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教徒在对宗教感性和理性综合认识的前提下做出的慎重选择。比如天主教徒A：多次去教会→参加分享会→要理班学习教义→去圣母山朝圣→阅读宗教书籍；天主教徒B：参加祝圣仪式→在教友帮助下去教堂→望弥撒；天主教徒D：去教会望弥撒→参加教会活动历经3年；天主教徒J：圣母堂朝圣看到神迹→参加教会活动→家庭关系改善。由此可见，

^①转引自[美]罗德尼·斯达克 罗杰尔·芬克著.杨凤岗译.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36.

^② [美]罗德尼·斯达克 罗杰尔·芬克著.杨凤岗译.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46—69.

^③ “Phenomenological Images of Religion and Rational Choice Theory”.pp133-146 in Young(ed)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d Religion.London:Routledge.1997.

转型期民众的宗教信仰是一个非理性与理性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第三，转型期民众的宗教皈依是一个功利与超越的双重交织。所谓超越性，是指教徒在现实的危机或者压力在宗教避难所中解决之后，随着宗教信仰参与的增加，得到了归属感、成就感的满足，从而其宗教生涯多了一份纯粹或虔敬，少了一份功利和现实。所谓功利性是从中国民众宗教信仰的契机来看，他们大都为现世今生的困惑所驱动，更关心此世的生活，体现出实用主义的特质。而在多数学者看来，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具有现实性和功利性，比较典型的如宗教学者 Jordan, David K.，他将中国人的信仰皈依归结为“千层派因素”（Glyphomancy Factor），即华人的宗教皈依呈现出三个鲜明的特性：皈依是有条件的（conditional）、皈依是累加性的（additive）、神明是互换性的（pantheon interchangeability）。^①但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定背景下，中国民众宗教信仰的契机与社会转型密不可分。心理学家罗杰斯主张把宗教与生存的焦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他认为来自本人以及应付生活中种种问题的不安或忧虑是对生命和满足的主要威胁，当人们身临困境时会趋向于信奉宗教。神学家刘小枫也认为，“社会是按照某种制度来分配资源和财富的，由于社会可供分配的资源本身的匮乏，亦由于迄今没有、在可以想见的将来也不会有任何制度能绝对合理地分配财富，个体地经受的损害、剥夺和不义，不可能绝然根除。超世宗教通过超越的彼岸和景观，为现世的属于人类的不安提供了安身立心的处所，通过超世身份获得的福乐弥补现世身份的受损。”^②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的改革转型期间，政治或经济利益受侵害的人自然会去寻找各种超世宗教的依靠。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我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相应地，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剧烈地冲击着中国民众的心理，引起了民众的心理震荡——人际情感疏离、人际信任危机加剧以及新出现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等现象带给民众心理上的失衡和不安全感。台湾学者金耀基将处于这个时期的人称为“中国过渡人”，并做了这样的画像：过渡人站在传统到现代的连续体上，一方面他既不生活在现代社会里，也不生活在传统社会里；另一方面他既不

^① Jordan, David K. *The Glyphomancy Factor: Observation on Chinese Conversion*. pp.285-303 in Robert W. Hefner(ed)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Histor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a Great Transformation*. Berkel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33.这里，所谓有条件性是指华人的宗教皈依依附于该宗教或是信仰系统的医疗系统的有效，更确切地说，华人对于宗教系统的判断乃是根据外在的标准而不是根据该信仰系统本身来决定，而其中“医疗”的成功与否是一个是否认同某一信仰或是宗教实践体系并继续保持忠诚的重要逻辑；所谓累加性是指由于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医疗系统可持续获得成功，大部分华人使用多种的医疗或宗教手段，而接受新的信仰不必然是要放弃原有的信仰，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累加而非替代的；所谓神明的互换性则是指一个人不断寻求神的帮助，当某一个神无法实现其愿望时，在亲友的介绍下他可能转而向其他的神求助，当这另外的神应验时，他便向他效忠。

^②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527.

生活在现代世界里，也不生活在传统世界里，他的生活受到现代导向、他人导向和
内我导向的多重影响。就中国社会的过渡人而言，他们所面临的价值困窘不仅在于
新与旧的冲突，而且还在于中与西的冲突，从而处于一种交集的压力之下。^①而处在
这种压力之下的中国“过渡人”最大的困境来自于精神方面，这种潜伏在民众内心
深处的心理危机一旦遭遇外力比如疾病、灾难等的推动，就会加速民众宗教认同的
过程。因为宗教，“文化怪杰”辜鸿铭认为，“能给人以安全感和永恒感。在自然力
的恫吓下，在冷酷无情的同胞面前，在令人恐怖的大自然的神秘感的驱使下，普通
百姓们转而求助于宗教——在这个避难所里他们找到了安全感。他们确信有一个超
自然之物以绝对权力控制着那些给予他们打击的力量……在那里他们得到了永恒
感……减轻了这个世界给他们造成的压力。”^②心理学家弗洛姆也曾指出，宗教之于
人的生存是一种定型的而精密的答案，由于它可以公开被人分享，并且由于众人可
以共同参加宗教仪式，所以即使最低的宗教也会使人产生一种合理感和安全感。的
确，宗教为许多人提供了广泛而单纯的社会接触机会，在集体性的宗教崇拜活动中，
在共同的读经、祷告及信仰的分享于共融中，那些孤独的人找到了伙伴，找到了共
同语言，也找到了心灵的寄托。比如天主教徒 A 说自己在接触天主教的过程中不再
孤独，话有地方说了，不仅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归属，也被信众团体的爱所深深打
动，找到了心灵的寄托。再如天主教徒 B 丈夫得了肝炎，在其他人纷纷避而远之的
情况下，教友们不仅募集了一些钱予以资助，而且还经常在日常生活中照料和帮助
他们。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社会中的普遍成年者，一般都倾向于安全的、有序的、
可预见性的、合法的、有组织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所能依赖的，而且在他所倾向
的这个世界上，出乎意料的、难以控制的、混乱的，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危险事情
都不会发生。也就是说，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需要，而教会正是通过自己的仪式，
对教义的宣讲等一系列的活动，满足了民众对安全、归属与爱的需要。比如天主教
徒 A 是在因家庭不和而自杀未遂的情况下接触天主教的。在教会，她说自己不仅得
到了教友热情的帮助，而且深受教会中大家都是兄弟姊妹的浓厚的人情味的感染，
不论职业贫富大家都一律平等的观念也异于世俗社会事实上存在的等级观念。这
一切使她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归属感，心灵有了依托。天主教徒 B 是在双目失明的
情况下接触天主教的，当时她是在教友的搀扶下参加了一位神父的上任仪式。当听
到教堂里唱圣歌时，天主教徒 B 说自己心里忽然满怀喜悦，久病以来第一次感到开心；

^①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78-82.

^② 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M].海南出版社，1996.43.

吃饭的时候，教友们对她更是备加照顾，第一碗饭是端给她的，夹菜看不见，有教友就一口一口地喂她。天主教徒 B 说她当时就想：除了我父母对我这样好以外，还有谁能这样对我？我一定要加入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借用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话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当然很少有虔诚的信仰，但他们一旦决定信教，很快就会觉得自身有一种内在的本能在不知不觉地把他们推向天主教”。^①用教徒自己的话说，就“从此以后有了困难和危险不会再害怕，我们有可以依靠的力量”，同时教会的牢固团结，兄弟姐妹之间的浓烈的人情味也在吸引着具有怀旧情结的中国民众。社会学家伯格曾用“飘荡的心灵”（homeless mind）来形容现代化进程中人们所产生的那种难以安身立命、无所依属的“疏离”与“飘荡”感，正是由于宗教信仰群体集结着特有的人情张力，才使它在世俗化的今天，于一定范围内仍然能够成为人们认同的对象。^②因此，转型期民众的宗教皈依是一个功利与超越的双重交织。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飞速发展同步出现的是人们精神世界的种种现象。宗教现象的大量涌现也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如何应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共同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课题。通过对转型社会民众宗教信仰状况的考察，我们认识到“宗教信仰不仅仅是哲学家安乐椅上的沉思对象，也不仅仅是神学家的护教学（apologetics）和辩证学（polemics）的书面文本，宗教信仰不仅仅存在于宗教典籍和宗教仪轨中，也不仅仅是社会行动者的制度语境；它还是宗教信徒在身、心、灵的活动中被践行的生命体悟和人生实践，是对生命意义和生活目的的集体关切，对于超验价值的共同体验和群体承诺。”^③而且，民众的宗教信仰也集结着许多难以分解的心理与行为密码，将民众的宗教信仰简单地视为落后和迷信，实际上是对民众精神世界的极大的误解和鄙视。此外，通过研究还得到以下两点启示：

第一，民众的宗教信仰与社会变迁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关联。一般而言，宗教的发展与活跃往往是社会大变动或转型期的伴生现象。据宗教研究中心统计，苏联解体前，俄罗斯联邦信教人口的比例为 22%，1994 年上升为 50%。韩国 1947 年信仰天主教基督教人口的比例为 7%，到 1985 年达到了 21%。^④现阶段，伴随着宽松的

^① [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M]（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54.

^② 转引自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32.

^③ 方文，群体符号边界如何形成？——以北京基督新教群体为例[J]，社会学研究，2005，（1）： 31.

^④ 叶小文，当前我国的宗教问题——关于宗教五性的再探讨[J]，世界宗教文化，1997，（1~2）.

文化环境及社会的安定繁荣，宗教在中国社会悄然复兴，宗教徒人数也呈上升的趋势，有学者将之称为“宗教热”（如马学琴、曹立波、赵鸿雁等）或宗教发展的黄金时期。这种情形一方面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全面落实和宽松的社会环境不无关联；另一方面则凸现出由于社会转型而带来的深层的社会问题。陈垣对宗教与社会现实环境之间的关系曾经这样描述：“人当得意之时，不觉宗教之可贵也，惟当艰难困苦、颠沛流离之际，则每思超越现境而适乐土，乐土不易得，宗教家们予以心灵之安慰，此即乐土也，故凡百事业，丧乱则萧条，而宗教则丧乱归依者愈众。”^①而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当一个社会不能给予成员正常的满足和疏导时，宗教便在一定范围内成为民众表达心灵叹息的媒介。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转型期，转型带来了价值观念、社会秩序、民众心理承受力的巨大震荡，也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发展的空间。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压力，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陷入了焦虑之中。而宗教不仅可以为感到被剥夺的社会弱势群体提供避风的港湾，而且也为相当一部分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人群的强势地位提供了合理化论证。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当一个幸福的人与不幸者比较其地位时，他不会满足于他所得的幸福，而是想得到更多的东西，也就是享有这种幸福的权力，以及相信自己前程似锦的意识；这与那些肯定倒霉的不幸者完全相反。我们的日常经历证明，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对一个人幸福的合法性或正当性再确认的心理需要，不论这种幸福是政治上的成功、优越的经济地位、身体的健康、情场的成功，还是其他什么东西。”^②由此可见，当前民众宗教信仰与社会转型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关联。

第二，民众的宗教信仰与社会变迁之间还具有非逻辑关联，民众的宗教信仰还有着脱离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特征。众所周知，宗教自产生之日，便与人类社会的历史相伴而行，迄今为止仍然生命力旺盛。世界上许多民族与宗教更是生死相随，比如犹太教与犹太民族，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民族等。究其原因，美国宗教社会学家托马斯·奥戴认为，“没有功能的东西便不再存在，这是功能理论的公理，既然宗教从古至今都一直存在着，显然它具有一方面甚至是一系列的功能”。^③人类需要宗教，宗教与人性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比如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认为，“在所有的生物中，只有人对本身的生存有一种天生的不满足感，总是希望人生不可限量。人

^① 陈垣. 明季滇黔佛教录考卷 6[M]. 科学出版社, 1959. 转引自马学琴. 宗教热原因探析[J].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第 1 卷第 2 期: 19.

^② [德]韦伯著. 刘援、王予文译. 宗教社会学[M]. 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4. 166—167.

^③ [美]托马斯·F·奥戴等著. 刘润中等译. 宗教社会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既轻视生命，又害怕死亡。这些不同的情感，不断地促使人的灵魂凝视来世；而能把人引向来世的，正是宗教。因此，宗教只是希望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而宗教的自然合乎人心，正同希望本身的自然合乎人心一样。”^①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干脆认为宗教是人性的本质机能之一。而从本质上讲，人自身的不完善和对超越力量的崇拜与追求使人的心灵天然的具有宗教的功能。无论今后科技发展到怎样高的水平，都不可能解释和解决人类遇到的自然界的所有难题。同时，无论人类历史演进到怎样高的阶段，不平等和不公正等社会问题和矛盾总会存在。但是人类永不满足的天性，决定了人类永远也不会停止对理想天国的憧憬和终极价值的追寻。因此，民众的宗教皈依有着脱离特定社会历史时期具体要素的存在依据，与社会变迁之间存在着非逻辑的关联。

综上所述，本文以太原市沙沟教堂和太谷区域社会基督教徒为研究对象，对转型期民众的宗教信仰状况特别是其信仰特征进行了探讨和分析。但在研究结束之际，重新检视整个研究过程时发现其中存在着诸多缺陷，比如试图以 18 名宗教徒为样本来揭示转型期民众宗教信仰状况，研究样本似乎嫌少。此外，研究样本也只局限于基督教徒。所以今后应该进行大规模的宗教信仰调查，以此来进一步了解和把握转型期中国民众宗教信仰的总体取向和特征。

^①[法]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论美国的民主(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343—344.

参考文献

- [1] 孟钟捷. 乡镇教会及其现代困境: 墟栖基督教会初探[J]. 当代宗教研究, 2004, (3)
- [2] 刘元春. 社会城市化发展中的佛教信仰问题[J]. 法音, 2002, (11).
- [3] 曾文瑛、黄镇辉. 城市化进程对宗教工作的影响[J]. 中国宗教, 2003, (4).
- [4] 李向平. 都市佛教: 当代中国佛教发展的都市形式及其社会特征[J]. 2004
吴孟庆、罗伟虹主编《宗教问题探索》(2003文集) 宗教文化出版社
- [5] 冯丹.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宗教的世俗化倾向[J]. 黑龙江社会科学, 1999, (1)
- [6] 宫哲兵. 武汉市宗教的现状与世俗化特点——当前城市宗教工作田野调查之一
[J]. 宗教学研究, (3)
- [7] 李庆钧. 霍布斯的秩序解说与转型期社会秩序的构建[J]. 社会学, 2004, (3):11、
12.
- [8] 米寿江. 当代视角下的宗教[M]. 江苏: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2. 1.
- [9] 陆学艺、景天魁.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 [10] 金耀基. 从传统到现代[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 [11] 姚南强. 宗教社会学[M]. 上海: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04. 217.
- [12] 李强. 社会支持与个体心理健康[J]. 天津社会科学, 1998, (1).
- [13]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132.
- [14] 贝格尔著. 高师宁译. 天使的传言[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5.
- [15] 李平晔. 中国宗教的历史特点及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 基督宗教研究[M]. 269.
- [16] 姚力.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发展的原因探析[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4, 第
11卷, 第3期: 71.
- [17] 李素菊, 刘绮菲. 青年与“宗教热”[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0. 18.
- [18] 陈安金. 当前大学生宗教信仰问题的思考[J]. 浙江海洋学院学报, 2000, (3):
72.
- [19] 罗伟虹. 中国的民间信仰探讨[J]. 社会科学, 1994, (8): 58.
- [20] 贝格尔著. 高师宁译. 神圣的帷幕[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63.
- [21] [美] 克里斯蒂安·乔基姆. 中国的宗教精神[M].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1991.
- [22] [俄] 列宁. 列宁选集[M]. 第二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379.
- [23] 樊志辉. 大众文化的兴起与宗教意识的苏醒. 载《中国宗教学》第一辑. 中国宗教

- 学会秘书处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 178.
- [24] 贾玉斌. 当前宗教快速发展的原因及对策[J]. 党政干部学刊, 2004, (8): 17.
- [25] 威廉·詹姆士著. 唐钺译. 宗教经验之种种——人性之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460—472.
- [26] 梁丽萍. 中国人的宗教心理: 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 21—23.
- [27] 罗纳德·L·约翰斯通著. 尹今黎、张蕾译. 社会中的宗教——一种宗教社会学[M].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75
- [28] [美] 罗德尼·斯达克 罗杰尔·芬克著. 杨凤岗译. 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29] 孙尚扬. 宗教社会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30] [德] 卢克曼著. 覃方明译. 无形的宗教[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31] 刘小枫.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8. 527.
- [32] 辜鸿铭著. 黄兴涛、宋小庆译. 中国人的精神[M]. 海南出版社, 1996. 43.
- [33] [法]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论美国的民主[M] (下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54.
- [34] 方文. 群体符号边界如何形成? ——以北京基督新教群体为例[J]. 社会学研究. 2005, (1): 31.
- [35] 叶小文. 当前我国的宗教问题——关于宗教五性的再探讨[J]. 世界宗教文化, 1997, (1~2) .
- [36] 马学琴. 宗教热原因探析[J].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第1卷第2期: 19.
- [37] [德] 韦伯著. 刘援、王予文译. 宗教社会学[M]. 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4. 166—167.
- [38] [美] 托马斯·F·奥戴等著. 刘润中等译. . 宗教社会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39] [法]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论美国的民主(上)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343—344.
- [40] [德] 西美尔著. 曹卫东等译. 现代人与宗教[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41] Jordan, David K, *The Glyphomancy Factor: Observation on Chinese Conversion.*

- pp.285-303 in Robert W. Hefner(ed)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Histor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a Great. Transformation.*Berkel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33
- [42] “Phenomenological Images of Religion and Rational Choice Theory”.pp133-146 in Young(ed)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d Religion.*London:Routledge.1997
- [43]King,WinstonL.*Religion*[J].In *The Encyclopedia.*Ed.Mircea Eliade.Volume12.New York:McGraw-hill,1987
- [44]Proudfoot,W.,*Religion Experience*[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 [45]Berger,Peter L.*The Sacred Canopy:Element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N.Y.:Anchor Books.1967
- [46]James,William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02/1985
- [47]Lofland, Jone *Doomsday Cult: A Study of Conversion, Proselytiz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Faith.* N.Y.:Irvington Publishers, Inc. 1981
- [48]Weber, Marx,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22
- [49]Yang, C.K.*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 Berkeley, Los Angel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致 谢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三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涯即将结束，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也即将付梓。一时间，心潮澎湃：毕业论文不仅凝结着我三年的心血，也是众人关爱的善果，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激。

本论文的完成，首先要感谢恩师梁丽萍教授。老师知识渊博，治学严谨，思维活跃。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从论文题目的选定到论文写作的指导，老师悉心的点拨，高屋建瓴式的开示，常常让我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开朗！由衷地感谢老师三年来对我的严格要求和关怀，使我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刻，对研究方法的运用更加得心应手。老师的勤奋、对事业的执着和对完美的追求，是我所望尘莫及的，更是我永远追求的典范。

同时，我还要真诚地感谢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全体老师和朝夕相处的同学们。感谢授课老师对我们的教导，你们丰富的授课内容拓宽了我的视野，让我能更顺利的完成这篇文章；感谢我的同学们，你们不仅让我感受到友情的力量，也让我感觉到了生活的愉悦，通过课堂讨论学到的思维方式将使我受益终生；特别要感谢王永平和王静涛两位同学，王永平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雪中送炭”，王静涛和我同是导师的学生，在学习和论文写作过程中，经常一起讨论，交流学习经验和心得，她们对我论文的完成帮助甚大；还要感谢太原市沙沟堂区的王根成神父和李庆隆老师，没有你们的热心帮助和大力支持，这篇论文是无法完成的。

最后，我要向我的家人表示深深的谢意。你们的理解、支持、鼓励和鞭策催我更加上进，我竭尽全力的努力，更希望的是能够让你们高兴和满意。你们的情感永远都是我上进的不竭的动力源泉。

限于时间、水平，文中的疏忽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有关专家、老师加以批评和指正，以臻完善。

韩新云

2006年5月30日

附 录

参与课题研究及论文成果:

1.“社会转型期民众宗教心理及其引导”: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专项课题,2003—2005.

2.论文.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探析[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5,第28卷,106.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个人资料

姓名：韩新云 性 别：女
民族：汉族 出生年月：1977.2
身高：1.63 米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籍贯：山西翼城 健康状况：良好
英语：国家六级 普 通 话：一级乙等

毕业院校：山西大学 培养方式：非定向
学 历：硕士研究生 所学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方向：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与社会思潮比较研究
联系地址：太原 115 信箱 030024
联系电话：(0351) 6520726 13994229279
电子信箱：happy19770217@sina.com

个人简历

1989 年 9 月—1995 年 7 月 在山西省翼城中学学习。
1995 年 9 月—1999 年 7 月 在山西大学师范学院政教系学习，获学士学位。
1999 年 7 月—2003 年 7 月 在太原市第四十九中学任高中政治教师兼班主任。
2003 年 9 月—2006 年 7 月 在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

工作去向：未定

承 诺 书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学位论文的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在读期间学位论文相关的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文献资料外，本学位论文不包括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成果。

学位论文作者（签章）：韩新云

2006年5月30日